

邓小平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杜幼康

[摘要]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从全球和战略高度审视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发展潜力和双边关系,以求同存异、着眼未来的思路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引导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并多次亲自向印方做工作。在邓小平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印两国逐步加强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2010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两国关系正处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关键词] 邓小平;中印关系;外交思想;和平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0)10-0075-05

邓小平关于中印关系的论述是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部门制订对印政策和进行外交实践的指南。值此纪念中印建交60周年以及两国分别举行“中国节”和“印度节”之际,重温邓小平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外交思想,回顾其相关外交实践所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仅有助于深刻领会和探究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深邃内涵,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全球和战略高度看待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发展同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历来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1950年4月中印建交后,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指出,“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并且认为“印度将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pp.133,290)}周恩来也强调,“印

度是亚洲的重要大国”,是“新中国和制度不同国家建交的第一个国家,工作很重要”。^{[2](p.18)}1954年6月,周恩来首次应尼赫鲁总理邀请访问印度,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认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关系恶化。直至1976年,印度和中国先后恢复互派大使,结束了15年来仅维持代办级关系的局面,中印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

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从全球和战略高度审视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发展潜力和双边关系。

第一,中印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分别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印两国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并非无足轻重;两国人口众多,加起来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加之中印两国又是近邻,“不互相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3](p.19)}简言之,中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中印关系研究”[08JZD0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作者:杜幼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印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中印两国对人类社会负有共同责任。1988年12月,邓小平与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时表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上来认识”,即只有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和平才有保障,发展才有可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此,中印两国应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3](pp.281,282)}

第三,中印共同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邓小平早在1974年就在联合国发言时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但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选择了与印度总理拉·甘地会见的场合。邓小平还强调,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3](p.283)}此后,中印双方在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进一步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4](p.63)}此举反映了邓小平对印度战略分量的认可以及对中印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期望。

第四,中印两国决定“亚洲世纪”能否到来。自19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后,亚洲又有所谓“四小龙”等相继进入经济快速增长轨道。但鉴于中印均为亚洲大国,其人口就占亚洲人口总数的60%以上,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洲世纪或亚太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3](p.281)}历史发展亦证明,直到中印两国先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推行经济改革,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后,亚洲的崛起才真正名实相符。

二、以求同存异、着眼未来的思路 推动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和议会于1962年12月通过了一系列反华法令,其军事与安全战略也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将中国视为

主要对手,此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相当冷淡的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先是主动恢复派出驻华大使,后又指派其外长访华。1980年英·甘地重新执政后在会见中国大使时表示,“20多年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两国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我希望这已成为过去。我们渴望同中国建立紧密关系,我们渴望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2](p.27)}此前,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对印工作重点,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的新思路,并多次亲自向印方做工作。

首先,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改善双边关系。1979年2月,邓小平会见印度外长时表示,中印双方要抓紧时间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一是从中印关系大局出发,双方应该求同存异;二是对于边界问题,可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三是边界问题不应该妨碍中印两国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邓小平还指出,中印在国际问题上有不少共同看法,并建议两国领导人要多来往,逐渐增进相互了解。^[5]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印两国共同努力,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发展两国关系”,“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3](p.19)}

其次,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但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印度为基地,不断越过这条传统习惯边界线,向中国边境扩张,并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而制造了以后的中印边界问题。考虑到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邓小平主张双方只能“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那就是“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这样“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邓小平并以中国与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为鉴,强调“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3](p.19)}

再次,在边界问题未解决前推动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鉴于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

性,全面解决尚需时日,邓小平针对印方原先的僵硬态度做工作,提出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3](p.20)}换言之,中印双方应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不让边界问题成为在双边其他领域发展关系的障碍,打开两国之间僵持局面。随着中印双方不断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和合作,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了,这必将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

最后,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着眼未来。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正式访问中国,这是时隔34年后印度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邓小平对其来访高度重视,并在会见他时提出,中印双方“要忘掉两国关系中过去一段不愉快,一切着眼于未来”。^[6]通过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向前看”达成共识:同意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并共同维护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努力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建立经贸、科技联合小组,签署科技和民航合作协定。也正是因为中印双方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此后两国重新走上了睦邻友好的道路。

三、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引导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邓小平就和平与发展问题多次发表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了科学概括。他在1985年3月会见日本一访华团时明确表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95)}这一重要判断为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进而制定具体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在引导中印关系未来发展方向上,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和平问题。中国和印度山水相连,而且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两国人民即开始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中印建

交后,两国曾经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也经历过一些波折,双边关系总体趋于成熟与稳定。1979年2月,邓小平会见印度外长时明确表示,中国和印度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各自的国家,^[5]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后,邓小平又在1982年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3](p.19)}进一步点明了中印互不构成威胁的实质。

二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在与拉·甘地会谈时指出,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中印两国是其中“最大的队伍”;归根到底,发展中国家要主要靠自己发展起来摆脱贫困,同时不要闭关自守。^{[3](p.281)}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印关系应朝着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发展,这也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三是合作问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指出:“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3](p.20)}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与发达国家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良好的政策”;为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3](p.282)}

四是双赢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印双方互不构成威胁,两国之间的问题不是很大,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但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方面存在着诸多共识和共同利益,即双方的共同利益明显大于分歧,因而很看好中印关系的发

展前景。基于这一判断,邓小平在中印双方着手改善两国关系不久,就态度鲜明地向印方表示,中印两国合作大有可为,“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3](p.20)}这是邓小平以不计前嫌和着眼未来的博大胸怀,表明了中方希望与印度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真诚愿望,也为中印双方此后开展良性互动、寻求合作双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和努力下,加上我国外交部门的积极配合,自拉·甘地成功访华后,印度对华政策加快调整,在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些问题上出现了积极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在印度的对外战略中,不再把中国看作是现实威胁,而是将改善中印关系作为其外交工作的重点,使印度同中、美、俄的关系趋于均衡发展。在双边关系方面,不再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发展中印关系的先决条件,而是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推进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在边界问题上,不再坚持要把中国人赶出所谓“印度的每一寸土地”,而是明智地选择了政治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在涉藏问题上,不再与西方沆瀣一气,而是保持适当距离,并对达赖集团在印从事反华活动进行一定限制。在军事交流方面,改变拒不接触的态度,恢复了中印军队之间中断近30年的联系。中印关系较为稳定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以邓小平对印外交思想为指导,开创中印关系新局面

邓小平的对印外交思想和实践推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事实证明,邓小平善于抓住机遇,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的策略,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指明了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邓小平的对印外交思想和实践,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富有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印共同崛起,两国关系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全球层面看,中国和印度均为世界文明古国,人口之和

超过25亿,是两个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和平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全球化进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亚洲地区而言,中印两国和平发展,不仅带动了整个亚洲的发展与繁荣,拓展了亚洲地区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大大增强了亚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明显加重了亚洲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分量,导致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由大西洋逐渐向太平洋转移。显然,只要中印两国和睦相处,两国共同和平崛起就有可能,“亚洲世纪”的到来就有希望,而中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能作出更大贡献。值此世界形势大变化、全球格局大调整、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中印双方迎来了建交60周年,两国关系处于新的发展起点上。此刻重温邓小平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外交思想,是要学习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内涵,并在其指引下,继续推进中印关系全面发展。

当前,中印两国领导人均高度重视中印关系,一再强调中印互不构成威胁,双方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两国的发展增加了互利合作的机遇。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中印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印双方需再接再厉,不断丰富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其迈上新的台阶。

第一,不断增强政治互信。中印两国已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立了战略对话、外交政策磋商、安全对话、反恐磋商、防务与安全磋商、财金对话等各种双边合作机制。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毕竟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两国在新形势下和共同崛起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有些西方国家还不时挑拨离间,企图从中渔利。这就需要双方高层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加深交往,加强沟通,坦诚相待,不断增进两国的政治和战略互信,以避免摩擦,排除内外因素干扰,及时发现和消除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二,不断加强经贸合作。中印两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重要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且互补性较强。2009年,中印贸易额为434亿美元,2010年上半年已达304亿美元,同比

增长接近55%。^[7]目前双方正在为2010年达到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努力,而中国也有望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也存在一些贸易摩擦,中国企业还不时受到印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干扰。因此,中印双方在继续拓展经贸合作领域的同时,需共同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以实现互利双赢,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并以经贸合作的扩大与深化推动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

第三,不断推动民间交往。近年来,中印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卫生、宗教、广播、旅游、新闻等领域的民间交往明显增加,双方人员来往持续增长,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印关系发展的民众基础。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印人口众多和互为重要邻国的状况,双方互访人员每年仅50多万人次,显然落后于深入发展中印关系的需要。鉴此,中印双方均需努力,进一步拓展两国人民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继续增进相互理解,营造两国友好气氛。

第四,不断增加防务交流。近年来,中印两国国防部和军队之间积极开展互访、联合演习、人员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使两军之间的交流进入了逐渐机制化和较为务实的阶段,并且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安宁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印度军方对中国的疑虑和防范之心犹存,这就需要中印双方充分利用在安全、防务、反恐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经常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加强交往,化解疑虑,增加共识,使业已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所建立的信任措施扩展到其他军事与安全领域。

第五,不断促进国际合作。中印两国均为中俄印、“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通过在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建立良好金融、贸易、

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维护了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全球化带来了诸多挑战,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唯恐新兴大国崛起影响其既得利益。对此,中印两国必须保持警惕,抵制各种分化图谋,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协调立场,相互支持,加强合作。

总之,中印两国“都肩负着确保两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责任”。^[8]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共同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已成为中印双方的不二选择。显然,这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2] 申健.出任驻印度大使的前前后后[A].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3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双边关系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5] 新华社.邓副总理会见瓦杰帕伊外长 指出我们要抓紧时间改善中印两国关系[N].人民日报,1979-2-15(1).
- [6] 刘水明.邓小平会见拉·甘地时指出中印关系一切着眼于未来[N].人民日报,1988-12-21(1).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2010年1-6月我国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EB/OL]. <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g/date/n/201008/20100807084627.html>,2010-7-28/2010-7-28.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N].人民日报,2008-1-15(4).

责任编辑:美景

such classical issues as how to perceiv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historical determinism, class and alienati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ost-modernism, liberalism and Marxism and other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se issues may help u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ing route of Marxism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advance the research of Marxism in China. (MENG Xin)

On the Thought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cessary quality and practical spirit in building advanced culture. By interpreting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e by the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to disclose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 thought and awareness, we can find something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alism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Qing-yun)

Mao Zedo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oriented Marxi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Xibaipo: The period of Xibaipo had been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in the building of a learning-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During those year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was to learn about policy and discipline. Mao Zedong had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comments and telegrams, providing basic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uilding a learning-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policies and disciplines helpe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China running along a healthy track. The practice in Xibaipo has given us such a revelation: emphasis must be placed on solving problems of the party from multi-levels;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policy and disciplines are the everlasting proposition in building learning-oriented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SUN Shi-jiang LU Ren-quan)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the New China: The period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 the basic completion of socialist reform in 1956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P. R. China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During the short 7 years, because of the correct guidelines and basic policies l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w China consolidated the people’s regime, completed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ahead of time,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system, built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all of which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Zheng-hua)

Policies about Private Economy of the Par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China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w China,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position and natur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basic policies to support, to make use of, to limit and to guide the private economy. After adjus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the basic policies had been carried out to reach the grass-root society. The policie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w China are of signific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uilding a multi-system with the public as the main body. (Miao Chang-wu)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 about Developing Sino-India Re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 and the need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s and India’s international statuses, development potentialities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a global and strategic perspective, pushed forward policie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eyes towards future while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reserving differences, guid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the times view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anks to Deng Xiaoping’s wise guidance and endeavor, China and India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strengthened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cultural areas, thus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We are encouraged to see that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as becoming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ir deeper friendship and better cooperation. (DU You-ka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ces and the Growth Point at New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ew open view is based on profound theory source and firm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ces for the innovative open view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form of open pattern has caus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which led to some social confli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accumulated began to loom. The innovative open view should be focused on five growth points: handling skillfu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change from the extensive open form to fine open form; handling skillfu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demands and foreign demands, change from satisfying foreign demands to domestic demands; handling skillfu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penness and subjectivity, enhance the subjectivity by openness; handl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handl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open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promot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y open introduction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n a higher level. (TAN Yang-fang)